

论原语和译语语言文化的差异性

[摘要]译者既是原作文本能动的读者,又是其创造性的再现者。原语和译语语言文化的差异性以及文学艺术语言的形象、生动性,为译者一提供了广阔的创造空间,为了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的艺术美,译者的主体性是不可缺少的。

[关键词]小说;翻译;主体性

《红楼梦》是中国小说发展的顶峰。自它公开发行以来,历经 200 多年,据统计迄今已有 9 个英文版本,包括节译编译和全译。其中,以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Hawkes)约翰闵福德(JohnMinford)的译文和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译文最为权威。本文就从这两个版本中的一些例子展开评述。

翻译活动中主客关系阐述自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主体认识论哲学确立之后,主客便已分离;主体认识客体、主体征服客体、主体控制客体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旋律。但是,要把这种认识论哲学的观点运用于一切社会科学的发展,则是失偏颇的!

就翻译来说,主客关系就是比较复杂的。首先,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是主体,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所译的文本要经过他的理解、阐释而形诸于目的语文字,原本就是他工作的对象,似乎就是客体了。然而,这文本又是“沉默的作者”的“代言人”,是“作者眼中看到的或心中理解的世界”,并非就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再现”;从这一点看,它显然不再是“纯粹的客体”了,而是胡塞尔称之为的“意向性客体”,或就是“隐含的主体(作者)”了;就读者来说,他可以是单个主体也可以是群体;不过,他(们)又是译者工作的间接对象,即译者会在译文中假定其读者(群)的“期待视野”,设想其“隐含读者”的接受水平、兴趣与艺术鉴赏力,考虑其“当下”的时代背景,读者(群)就变成间接客体了。因此,在翻译活动中,各因素之间紧张的单纯的主客对立关系已经消解,进而形成的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即译者主体要与文本(隐含的作者)、读者(间接客体)之间保持一种协调的“商谈式”的平等对话关系,而不只单纯是认识与被认识、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不仅仅是语言符号转换的过程,更是文化信息传递和感情移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作为沟通原作者与读者、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桥梁,他的表现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译作的优劣因而成为翻译过程中最积极、最主动的因素。其主体性也就是他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自觉的人格意识和创造意识。谢天振的《译介学》中“创造性叛逆”命题的提出,也正是对译者主体性的认可和论证。[1](P362) 我们可以引用查明建、田雨为译者主体性所作的界定:“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2]翻译过程中最积极、最主动的因素就是译者的主体性。其主体性也就是他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自觉的人格意识和创造意识。《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对比

1. 侵入(aggression)

顾名思义,侵入,就是指为了使源语所讲的东西更容易为目的语读者能理解而对源语内容的更改。我国唐代的贾公彦曾说过“译既易”。霍克思通常在处理源语和目的语的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时运用这种方式,尤其表现在他处理英汉语言之间在语音和语言技巧时。它通常使译文为目的语读者更容易理解译文,但同时也是对译者自身创造性地挑战。例如副册判词之一: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

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第五回)霍译:Seldom themoon shines in a cloud-less sky,And days of brightness alltoo soon pass by.A noble and aspiringmind,In a base-born frame confined,Your charm andwitdid only hatredgain,And in the end you were bystanders slain,Your gentle lord' s solicitude invain. (Vo.I I, P132)杨译:A clearmoon is rarelymetwith,Bright clouds are easily scattered;Herheart is loftier than the sky,Butherpersion is of low degree.Her charm andwitgive rise to jeal-ousy,Her early death is caused bycalumny. In vain her lovingmaster' s griefmustbe. (Vo.I I, P74)这首判词是写晴雯的。雨后新晴叫霁,寓“晴”字;云呈彩叫雯,寓“雯”字。第一、二句,杨宪益译得很准确,而霍克思却将第二句的“彩云易散”译为“晴天易逝”了,似乎与原意不符,殊不知这正是霍克思匠心独运之所在。霍氏在译本中将男女主角音译其名,丫鬟名字译其意,有时照字面,有时照性格。晴雯则照字面意义译为 Skybright。这里原文两句分别寓“晴”“雯”二字,和第二句也分别有“sky”“brightness”二词,虽然他的第二句不与原文一致,然而却传达了同样的信息,产生了同

样的艺术效果。相比之下,杨将书中人物全部音译其名的做法,使他在无法再现原文暗寓人物姓名的特色。他的译文虽然准确无误,然而译文读者却无法从他的译文中看出判词所暗示的人物,这不能说不是一大缺憾。

2.吸收(absorption)

吸收是霍克思处理文化载体语境的策略之一。也就是用目的语读者所熟悉的形象来代替源语中的形象,以便于译文读者理解译文更容易一些。在吸收源语内涵的过程中,肯定会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那么译者的主体性就是肯定会牵涉到的了。例如《女儿曲·其二》(冯紫英): 你是个可人,你是个多情,你是个刁钻古怪鬼精灵,你是个仙也不灵。我说的话儿你全不信,只叫你背地里打听,才知道我疼你不疼!霍译:You're so exciting, And so inviting; You're my Mary Contrary; You're a crazy, mad thing. You're my goddess, but oh! you're deaf to my praying. Why won't you listen to what I am saying? If you don't believe me, make a small investigation: You will soon find out the true depth of my admiration. (Vo. I II, P56) 杨译: You can bill and you can coo, Be an mi p of mischief too, But a fairy? No, not you, As my word you doubt. Ask around and you'll find out I love you, yes, I do! (Vo. I I, P412~413) 冯紫英是神武将军冯唐之子,略通文墨而已,他所唱的小曲是一首市民打情骂俏的俗曲(原名《可人曲》,清无名氏作,收入王《悠然回肠荡气曲》中)。

杨宪益对这首唱曲的处理有独到之处,译文简洁利落,语言风格完全吻合原文小调活泼调皮的特点。“bill and coo”绘声绘形,“an mi p of mischief”更是神来之笔;整个译文节奏轻快。霍的译文在语言上和杨的平分秋色,但比杨的更加通顺。他把“刁钻古怪鬼精灵”翻译成“Mary Contrary”。

3.补偿(compensation)

补偿是霍克思用来弥合英汉语言差异的另一方法。他宁愿多花费一些功夫去做一些解释,而不是简单的用英语中的一些形象来直接代替,而且把他的解释又和译文联结在一起,这样,他就可以避免增加脚注,以便于保持行文的流畅。例如: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与脂粉。(曹雪芹, 1993:299) 在这个例子里“莲社”、“东山”都是指古代知识分子非常出名的聚会。在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是远低于男性的,所以她们被排除于各种男性的诗社集会,例如莲社。但是在东山聚会中,有一个女才子力压众男子。因此,探春用此来暗寓女子并不比男子低劣卑微。杨把这两个典故直译为“Lotus Society”和“Eastern Hills”,并给译文增加了脚注: Yangs': Why should the genius of the Lo-tus Society be confined to men? Why should girls be excluded from cultured gatherings like those in the Eastern Hills? (Yang, 1994:725) Notes: Monk Huiyuan of the Jin Dynasty organized this society in Lushan. The Jin Dynasty landlord-official Xie An used to organize cultured gatherings in his country retreat. (Yang, 1994:1283) 从以上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杨先生认为古代女子是被排除于“莲社”、“东山”的,但是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虽然译者试图通过脚注的形式来向译文读者来解释,但却很难达到预期的读者视野。相反地,霍克思采用把“莲社”、“东山”通俗的译为“poetry clubs”和“tunable concert”,并且补充道“只有那些开明的长者认为有资格时才会邀请他们”,并借此来区分才子聚会和普通的文化聚会间的差异: Hawkes': Why should the founding of poetry clubs be the sole prerogative of the whisk-ered male, and female versificators allowed a voice in the tunable concert of the muses only when some enlightened patriarch sees fit to invite them? (Hawkes, 1977:214) 每种翻译策略都有它自己的优势,霍克思和杨宪益的各自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完成翻译的目标,但不管什么方式,都是为了向目的语读者传达阅读的快乐。在这里,霍克斯表现了更多的主体性。

译者不是处于一种附庸地位,他是平等的、自由的、充满活力的个体。但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他的自由是受到限制的,他的能动性同时还包含着受动性。受动性“既表现为人对客观对象的依赖性,又表现为客观对象对人的制约性”。[3]从哲学意义上来讲,受动性是能动性的前提,是人发挥能动性的依据。离开了受动性,能动性就发展成了盲目性,失去了改造客观事物的意义。在翻译过程中,原语与日标语两种语言的特点、规律、异同,原作者与作品的特点,译者所处的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等都是制约译者的受动因素。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正是这些受动因素的客观存在构成了凸显译者主体性的客观环境与前提。[4]

有关译者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已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这反映了译作文化与译者文化地位的上升。随着这一研究活动的深入,它必将对我们进一步掌握翻译活动的规律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 2003.

[2]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J].中国翻译, 2003, (1).

[3]杨武能.尴尬与自如?傲慢与自卑——文学翻译家心理人格初探[J].中国翻译, 1993, (2).

[4]高宁.论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兼论翻译标准的设立原则[J].上海科技翻译, 1997, (1).

 51lunwen.com

 无忧论文网

 51lunwen.com